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文艺评论方阵

谭桂林 卷



PDG

文艺评论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文艺评论方阵

责任编辑:萧汉初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424-9/I·1812

本方阵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谭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稿纸

！ 将本世纪的开端和结尾比较一下就可看到，选择各自自诩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乃是世纪末都市人文知识分子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世纪初和世纪末的中国都市社会都曾经历过快速的发展，但在世纪初的都市中，人文知识分子抵御的主题是机械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物质、感官上的刺激与压抑，在那时，人文知识分子虽然实际上居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但他们在整个社会所进行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中，由于自己掌握了先进的启蒙话语方式，因而在他们的言论中非常豪迈有力地把自己置放在一个履行中心位置上，他们对此怀有不被理解不被响应的孤独，但是敢于向都市的庸众宣战，敢于声称世界上最孤独者是

15-18=270

※ A 9, 10, 95, 17

第

页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百年文学综论

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 /001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 /030

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子夜》的贡献 /053

论现代中国文学的都市诗 /080

都市心灵的自我拯救 /103

论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性爱叙事 /121

学术思潮争鸣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性质与意义的质疑 /142

后现代批评的历史定位与理论质疑 /162

评近年来对学衡派的重估倾向 /179

民本主义：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时空规定与历史使命 /188

九十年代散文热的文化透视 /201

呼唤当代文学的童年母题 /213

关于小说文体实验的几则随想 /219

湖南文学评论

寻求与创作主体的精神共振 /224

——关于湖南文学批评发展的笔谈

混沌与退化 /230

——评孙健忠《死街》

守着土地，也守着那份浪漫与真情 /234

——读孙健忠《倾斜的湘西》

写出文化封闭中的艰难选择 /237

——评肖建国长篇新作《血塄》

评残雪近期创作的蜕变倾向 /245

生命原色·江湖文化·历史选择 /254

——评林家品长篇小说《野魂》

守住生命的诗意与灵光 /262

——评武俊瑶的散文创作

蔚为儒者之光 /268

——评李建盛历史小说《梦断帝乡路》

消费意识·大众精神·文化品位 /271

——周康渝现象的电影本位分析

谭桂林主要著作目录 /284

总跋(谭 谈)/285

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

无须仔细寻找,我们就可以开列出一长串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佛教文化的中国现代作家名单。他们中间既有新文学的开山祖师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也有在二十年代已经成名的郁达夫、许地山、废名、宗白华、瞿秋白、丰子恺、夏丏尊等,在更为年轻的第二代新文学作家中,如老舍、高长虹、施蛰存等等,也与佛学有着各种深浅不一的因缘。至于那些曾经以佛教文化作为创作题材的现代作家与作品则是难以计数了。佛教文化,尤其是这一文化系统中的精华部分——佛教哲学作为一种对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求根本解决的深刻智慧,它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中确实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所着重讨论的是,现代作家接触佛教文化这一事实的历史渊源与当代思想文化背景、现代作家与佛教文化之间种种关系类型的四种主要模式,以及现代作家与佛教文化在精神联系上所呈现的几个主要特点等三个问题。一言以蔽之,也就是论述现代作家在与佛教文化发生关系时所呈现的

共同性方面,以此为本课题的个体研究提供一个综合与宏观的文学史背景。

—

从佛教流变史来看,明清以来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派别已经进入衰微期,律学弛懈,名德依稀,荒山古刹,凋零败落。但自晚明到近代的数百年间,作为佛教的理论基础的佛学,却在佛教一蹶不振的总体趋势中经历了两次复兴。近代这次佛学复兴,主要是由一批改革家发起的。他们治佛学固然兼有学术上的兴趣,但主要目的在于用佛义与佛语来附会阐释自己所鼓吹的新思想和改革主张。康有为在广州立万木草堂授徒讲学,即取佛之《华严经》来阐释其大同理想。谭嗣同曾从佛学专家杨仁山习内典,遍阅《华严》及心、相二宗。他的《仁学》以佛家学说为真理极诣,把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用佛教的词汇加以说明。梁启超从佛学中看出智信、兼善、入世、无量、平等、自力六大优点,并且从佛教心理学出发,提出“转识成智”的主张,号召进行新民之启蒙。这也是利用佛学比附现代哲学,为自己的改良主张作思想根底。章太炎为一代国学大师,因苏州报案入狱后曾三年专修唯识,后来以唯识学说与西方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强调发扬个体主观精神以改造社会。甚至如秋瑾等并不以学问为重的革命家,在其为鼓动宣传而写的一些政论文章中,佛学义理与佛学语汇亦是随处可见。在那些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学改良方面的维新派人士那里,精通佛学者也大有人在。倡导小说界革命的夏曾佑曾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一同研习佛典,诗界革命的巨子黄遵宪,“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是

为诗界开一新壁垒。”^①钱仲联认为这在佛学影响中国旧诗内容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光辉的结局。可以说,推崇佛学,从佛学义理中寻求社会改革的思想武器,或者用佛理去贯通附会自己所接受的西方新学,几乎是当时维新派人士的一时之尚。二十多年后兴起的五四文学革命,在引进西方各种近代人文主义思潮方面,所使用的语汇、所采取的方法无疑地道得多了,也更为规范化,用佛学语言来附会西方新学的现象已经罕见。但是,由于那一代维新派人士大都是集大学者、大文学家、大思想家于一身,他们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以及他们退隐后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使得他们所造成的影响远不是一代人就可以终结了的。在维新派与五四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们之间,不少人保持着师生朋友的缘分。这种种关系往往使当年维新派推重佛学的态度以及研治佛学的兴趣得到直接的承传。至于间接的思想影响则更是广泛深远。当年严复评《天演论》和《群学肆言》。“多是采用佛学之名词,且多附论佛学之思想。”^②我们只要看看有那么多的新文学作家在回想当年读到《天演论》时的兴奋与狂喜,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新文学作家对佛学抱有好感了。

自宋代以来,受佛学影响的文学家甚众,晚明的李贽、公安三袁更是以释通儒、儒释相兼,并且用佛教的自由独立的心性观来待人接物,衡估世事,自觉地对宋明理学道统进行批判与抗争。他们一生的活动与佛学渊源甚深,李贽晚年曾抛妻别子披剃入僧,袁中郎英年早逝,但结交僧徒颇众,而且还曾与僧友隐居寺院,潜心道妙,撰有不少佛学著作。围绕在李贽、三袁周围,还有焦竑、陶石簪等许多志趣相似、佛学造诣亦深的诗人学者。这种居士佛学的成就及其对佛学复兴的贡献,对文坛造成的影响,是可以与晚清维新派人士相媲美的。

现代作家中不少人喜爱晚明文学,因而说新文学数代作家对佛学的兴趣有些是来自晚明文学的启示,是有案可稽的。周作人即是一例,他虽然师事章太炎,但他并没有追随章太炎由唯识与因明学的通道走向唯心主义玄学,而是沉沉实实地从佛经中寻找合乎人情物理的地方,这一读经思路就明显与李贽、袁宏道、陶石簪等人一脉相承。曾写过《鸠摩罗什》、《黄心大师》等佛教题材小说的施蛰存,其深湛的佛学造诣当与他对晚明小品的酷爱大有关系。至于三十年代弥漫文坛的对晚明小品的推崇思潮,或多或少也对新文学作家与佛学的接触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晚明性灵派与晚清维新派所掀起的这两次佛学与文学的联姻,其旨趣是不一样的。如前所述,近代维新派推举佛学,是因为佛学能够与他们所崇奉的新思潮相贯通,精研佛学的目的在于改良社会、改良政治;而晚明性灵派推举佛学,则是因为佛学是“内典”,是“性命之学”,精研佛学的目的在于个体的修心养性,在于人生的解脱与苦难的超越,在于对有情世间各种名缰利锁的摆脱。一者向外,一者返内,因而,这两个源头也就导致了新文学作家在与佛学的联系中形成两种差异比较明显的风格。偏于前者的作家,其艺术精神往往深邃、繁复、博大、广远,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气概;偏于后者的作家,其艺术精神则往往清空、幽深、隽永、冲淡,呈现出飘逸超脱的旨趣。就作家本人而言,前者往往与时代共进,后者则很容易由隐逸而遁世,最终落入歧途。但是,从现代文学艺术风格的建设要求来看,佛学渊源的这两种影响都具有一定的贡献。

佛教教义繁复,宗派林立,但无论何宗何派,其理论的根本旨归都在于教导芸芸众生认识世间苦以及求得根本解脱这世间苦的妙法途径。所以,哪一个时代给予人们的苦难特别

深重,哪一个时代的人们在心理上、情感上就特别容易与佛接近。魏晋时代,尚佛成风,其原因当然是多元的,但主要的一点恐怕还是出之于魏晋人在战争频仍、生命无依的境遇中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五四时代的新文学作家对佛学的好感亦可作如是观。从民国元年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数年内,是二十世纪中国苦难最为深重的一段时期。这种苦难当然包括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成员在物质生活与肉体方面的苦难,但更突出的则是不堪忍受的精神重负。首先,这个最黑暗的年代曾经有过两次耀眼的光明莅临:辛亥革命对清王朝的倾覆与五四运动的全民觉醒。但这两次光明的闪射旋即被更为浓重的黑暗所吞没。其次,由于西方列强资本的大量输入,本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城市与乡村的遽然分化和裂变的过程,一方面是都市的膨胀与西方化,一方面是乡村的闭塞与贫困化;一方面是日趋激烈紧张的生存竞争与物欲横流,一方面是相对的闲静、恬适与世风淳厚。而那些曾经为光明呼喊战斗过的先觉者们大多数恰恰就是由时代大潮从乡村裹挟到现代都市中去的。在由乡下人到都市人的转型过程中,他们普遍地用记忆中的“父亲的花园”来抵御现实中的物欲冲击。这样,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灵性与肉性的对抗,这双重矛盾把第一代新文学作家钉在了精神苦难的十字架上。由于佛学中的破除法执可以淡化对理想的执著,破除我执可以缓解肉体对精神的迫压,而佛教讲究的禅定也能使人暂时忘却现实中的苦恼,处于一种心灵澄彻静寂的状态,因而,佛学对于这些迫切需要解脱精神苦难的敏感的先觉者们来说,亲近感的形成当然是很自然的了。鲁迅广读佛经正是在民元以后到五四运动前夕这数年间,也就是鲁迅所谓“用了种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③的时期。周作人在二十年代初期,对苦

茶已经品出滋味,以后愈沉愈深,终于将自己的书堂品成了“苦雨斋”。无论这“苦”的内涵何在,对世间苦的慧悟以及超解的努力无疑是周作人研习佛典的主要心理动因。佛陀认为有情世间乃苦集之场,但苦谛当知而不当断,也就是说大智大勇者知道人生无处不苦,但并不回避苦难,而是要在苦难的磨砺中救世度人。对现代作家而言,痛苦,无论是时代赐予的,还是个人命运中一些偶然因素铸成的,最终都被升华转化为艺术力量。这种相当厚实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形成当然得益于佛家苦谛的启示。中国是一个佛教大国,佛教的一般性知识与理论传布甚广,尤其是在知识界,有些并没有专门研习过佛典的人,也很可能通过种种别的途径,间接地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

严北溟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儒家艺术或道教艺术之类的特定概念?当然,并不是说儒道思想对文学艺术不发生影响,它们的影响在许多方面也是很大的,但并不像佛教那么集中和精深,没有出现过像佛教艺术那样丰富多彩的特有风格和独立生命。”^④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影响的“集中”与“精深”,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异军突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创立了一种具有“特有风格和独立生命”的佛教文学和佛教艺术,偈语、禅诗、佛像、浮屠造型等等均属此类。二是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与进步。佛教文化传入后,中国文学曾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刘熙载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⑤这一“变”主要发生在语言文字上。为了尽可能广泛地传教布道,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僧侣与文人们采用了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梵汉结合、韵散相间,但求通晓,不加藻饰,自由畅达,质而不野。那些僧侣翻译家大都学养深

厚,常与士大夫往来。他们互通声气,有利于扭转汉魏以来文学重于辞章骈偶、追求雕饰华靡的趋势,而佛教说法中的“经变”故事,完全是用口语宣讲,所以能取得极佳的效果。这种以口语为工具的经变故事直接开了唐宋明清白话小说与白话戏曲等俗文学的先河。胡适认为,中国佛教的译经体及变文,以其“宗教经典的尊严,究竟提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留下了无数文学种子在唐以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佛寺禅门遂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这是一大贡献。”^⑥这种贡献,由于本世纪初敦煌千佛洞中的大量经卷被发掘出来,则更看得清楚了。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联系,一些新文学革命的主将们,即使对佛教义理并不抱有兴趣,但也怀着很高的热情研究佛典。他们研究佛典的目的不外乎两点。一是为新文学的语言形式、写作手段寻找有益的借鉴与养料。周作人嗜读佛经,他自称是把它们当作好的文章来读,他在北大讲授六朝文学时,曾建议增设“佛典文学”一章,希望学界“注意于译经之文学的价值”。胡适提倡白话,则号召新文学作者多读禅宗语录,认为宋时佛教禅宗语录是我国古代极好之白话。他在清华为学生开设的国学必读书目中竟有三分之一是佛学典籍。胡适本人也曾潜心研究过禅宗,写过一些学术价值很高的论著。第二是以佛典文学及其影响来为新文学运动言文一致、树立白话文正宗地位的主张相辩护。胡适《白话文学史》煌煌数十万言,用了大量篇幅讨论佛典文学,并且放言不悛地宣称,中国文学史即是一部白话文学史,因为文言文写成的文学是死文学,而白话文学则是活文学,是发展、流动与变迁的文学,代表着文学演变的趋势。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在介绍敦煌俗文学的发见时也指出:“我们向来说到唐五代的文学,只知道有典雅的诗词散文骈文,谁知道除了这些文